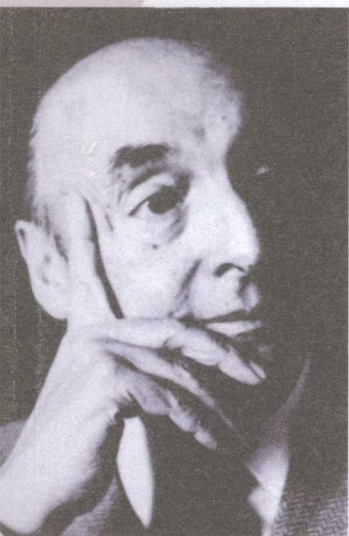


世 界 文 学 大 师 纪 念 文 库



聂鲁达集

赵振江 主编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Pablo
Neruda*

聂鲁达集

赵振江 主编

世界文学大师纪念文库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Public
Viv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聂鲁达集

(智利) 聂鲁达著; 赵振江, 滕威主编.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1

(世界文学大师纪念文库)

ISBN 978-7-5360-5017-4

I. 聂... II. ①聂... ②赵... ③滕... III. 聂鲁达
(1904~1973) —纪念文集 IV. K837.84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1807 号

责任编辑: 林贤治 胡雅莉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平面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4.5 1 插页

字 数 45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编 选 前 言

文学史源远流长。回顾时，我们当会发现，这个不断衍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与少数作家的天才的艺术创造密切相关。这是一群卓异的人物。对于世界和生命，他们有着独特的发现，而且凭借富于个性的语言，出色地表现这一切，包括伴同这发现的敏锐的感觉、想象力和无尽的激情，以及内在的更深隐的精神结构，比如社会理想、理性、道德、人格、美学原则，等等。他们彼此之间，无疑存在着天才的差异，但都以各自独特的艺术个性构成“范式”，影响同时代人乃至后世，形成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文学传统。当然也有沉寂一时者，但是，其文本的潜在的影响力是恒在的。对于这些作家，我们习惯地称之为“文学大师”。

在此，我社编辑出版一套大型丛书《世界文学大师纪念文库》，旨在通过系列大师的介绍，显示不同国家和时代的文学的高度。

丛书呈开放式，选材严格，每人一集；至于时代国族，则不设限界。一集之中，以作品为主，另行选入相关的传记及评论文字；每集前后均置有作者概述及生平年表，使读者对作家有更直接、更完整、更深入的了解。在译文方面，尽可能选用多家，冀有翻译史的线索可寻。对于翻译界前辈所做的开启性的工作，这也当不失为一种纪念。

因译者不同，译文先后发表时间不一，书中有关的人名地名等译法多有出入，为保持原译作的完整性，今仍其旧。

图片由多方搜求所得，是书中有机的组成部分，不独装饰而已。

《世界文学大师纪念文库》的编辑出版，是一个累积性的文化工程。在编辑过程中，承蒙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学者、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同行的襄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意的感谢。

花城出版社

2008年1月

高山意志，大海情怀

——聂鲁达的生平与创作

义务和爱情

是我的两只翅膀

——巴勃罗·聂鲁达

聂鲁达，多么动听而又多么熟悉的名字，然而它的译音并不准确，准确的译音应该是内鲁达（Neruda）；但诗人自己却很喜欢这个“聂”字，因为他说自己有三只耳朵，其中一只专门用来倾听大海。诗人的确有着大海一样的胸怀，大海一样的情感，大海一样的气魄。至于他为什么叫聂鲁



聂鲁达

达，按照诗人自己的说法，是为了瞒过不愿自己的儿子成为诗人的父亲，才从一本杂志上找到这个捷克人的名字的，那时他只有14岁。

聂鲁达原名叫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1904年7月12日出生在智利中部的帕拉尔城，此地盛产葡萄酒，他的祖辈即以种植葡萄和酿酒为生。1906年他家迁居智利南部的特木科镇；父亲是一名铁路司机，母亲在他刚刚满月的时候就去世了，幸好他有一位慈祥的继母。

聂鲁达在特木科读中学的时候便开始写作。1917年7月他在特木科的《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热情与恒心》的文章，署名内夫塔利·雷耶斯，这是诗人第一次发表作品。从此以后，他不断使用不同的笔名在家乡和首都的学生刊物上发表习作。1919年玛乌莱省举办诗歌比赛，他的诗《理想夜曲》获三等奖。从

1920年起，他正式使用巴勃罗·聂鲁达作为自己的笔名。1921年3月，聂鲁达离开家乡到圣地亚哥教育学院学习法语。不久，他的诗《节日之歌》在智利学生联合会举办的文学竞赛中获一等奖。192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晚霞》，第二年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问世，引起智利文学界的瞩目，奠定了他在智利诗坛的地位。紧接着他又发表了诗集《伟人的尝试》（1925）、《指环》（1926）和小说《居民及其希望》（1926）。

从1927年起，聂鲁达在外交界供职，先后任智利驻仰光（1921）、科伦坡（1928）、雅加达（1930）、新加坡（1931）、布宜诺斯艾利斯（1933）、巴塞罗那（1934）、马德里（1935—1936）和墨西哥城（1940—1942）的领事或总领事。这期间的主要诗作是《大地上的居所》。

1936年6月，西班牙内战爆发。聂鲁达坚定地站在西班牙人民一边，参加了保卫共和国的战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智利政府要他离职。诗人怀着极大的愤怒与痛苦回到了自己的祖国。1937年发表了不朽的诗篇《西班牙在我心中》。然后他又奔走于巴黎和拉美之间，呼吁各国人民声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1939年3月他被智利政府任命为驻巴黎专门负责处理西班牙移民事务的领事，他竭尽全力营救集中营里的共和国战士，使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来到拉丁美洲。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改变了聂鲁达的诗风。他决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诗歌创作上。1940年8月他到达墨西哥城就任总领事的工作，并访问了美国、危地马拉、巴拿马、哥伦比亚、秘鲁等许多国家，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在此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英勇的苏联人民正在与法西斯浴血奋战。聂鲁达到处演说，呼吁人们援助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1943年11月，聂鲁达回到圣地亚哥。他在黑岛买下了一处别墅，在那里着手创作他最重要的诗作《漫歌》。

1945年在聂鲁达的一生中是难忘的一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获得了智利国家文学奖，并于同年加入了智利共产党。这时候，聂鲁达既感到兴奋和骄傲，又感到忧虑与失望。在巨大的硝石和铜矿区，成千上万没有进过学校、没有鞋子穿的劳苦大众投他的票，然而与此同时，那些衣着华丽的达官贵人却在灯红酒绿中消磨醉生梦死的光阴。他经常在荒凉地区最穷苦人家的茅屋里过夜，给他们朗诵自己的诗作，听他们诉说苦难和希望。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在他当时的诗歌创作上

留下了鲜明的烙印。

1946年智利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大批的共产党人被投入监狱。聂鲁达不得不中止《漫歌》的创作。他的住宅被放火焚烧，他本人遭到通缉，被迫转入地下，辗转在人民中间。在此期间，他创作了长诗《1948年纪事》并最终完成了《漫歌》。

1949年2月他离开了智利，经阿根廷去苏联，并到巴黎参加了世界和平大会。他到过欧美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积极参加保卫和平运动。1950年他获得列宁国际和平奖金。1951至1952年，他暂居意大利，在此期间曾来中国访问。1952年8月智利政府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人民以盛大的集会和游行欢迎他的归来。回国后，他过了几年比较安定的生活，除参加国际文化活动之外，便专心从事创作，完成了《元素的颂歌》（1954）、《元素的新颂歌》（1956）和《颂歌第三集》（1957）。1957年他当选为智利作家协会主席。同年再次来华访问。

6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幻不能不对他的创作灵感产生影响，但是对于一个“历尽沧桑”的诗人，希望之光是不会泯灭的。1969年9月，他接受了智利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在《回忆录》中说：“每个地方都要求我去。成百成千的普通人，男男女女都紧紧地拥抱我、吻我并且哭泣，他们把我感动了。圣地亚哥郊外贫民区的人、科金波的矿工、来自沙漠的铜矿工人、怀抱婴儿等候好多小时的农村妇女、从比奥比奥河流域到麦哲伦海峡对岸那些受到冷落的穷人，在滂沱大雨中，在大街小巷的泥泞里，在冷得使人发抖的南风中，我向他们讲话或者朗诵我的诗。”这次竞选只是促成人民联盟各党派合作的战略。当人民联盟推举阿连德为共同候选人之后，聂鲁达立即退出竞选，支持阿连德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在此期间，聂鲁达的诗作有《出海与返航》（1959）、《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1960）、《智利的石头》（1961）、《典礼之歌》（1961）、《全权》（1962）、《黑岛纪事》（1964）、《鸟的艺术》（1966）、《沙上的屋子》（1966）、《船歌》（1967）、《日之手》（1968）、《世界末日》（1969）、《依旧》（1969）、《燃烧的剑》（1970）、《天石》（1970）、《无用的地理学》（1972）、《孤独的玫瑰》（1973）以及政治诗《鼓动刺杀尼克松并赞美智利革命》（1973）等。

1971年4月他被阿连德政府任命为驻法国大使，同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同年9月23日，

巴勃罗·聂鲁达与世长辞。

在聂鲁达逝世以后，人们又出版了他的诗集《冬天的花园》、《2000年》、《黄色的心》、《疑难集》、《挽歌》、《海与钟》、《挑眼集》以及回忆录《回首话沧桑》、散文集《我命该出世》等。1980年，西班牙巴塞罗那还出版了他少年时代的诗文集《看不见的河流》。

巴勃罗·聂鲁达是一位多产的诗人，生前发表的诗集有数十部之多。他的诗歌题材是广泛的，艺术风格是多样的，创作道路是曲折的。他的诗作内涵丰富，仪态万千，但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都是他心灵的歌。就意境而言，无论是清晰的还是朦胧的，都是他心境的写照；就文字而言，无论是优美的还是粗犷的，都是他心声的反响；就风格而言，无论是婉约的还是豪放的，都是他心情的表露。诗如其人，在他身上，诗品和人品是统一的。

聂鲁达出身于工人家庭，低下的社会地位，贫困的童年生活，幼年丧母和父亲外出，造就了诗人沉默寡言、善于思考的性格以及对大自然和外部世界的关注与向往。聂鲁达与秘鲁先锋派诗人塞萨尔·巴列霍一样，都是外省人。但是后者出生在一个保留着传统和宗教的道德观念的家庭里，而聂鲁达的童年却是在智利南部边境地区的开拓者中间度过的，这些劳动群众大多不信教。因此，巴列霍的诗歌反抗传统、肢解语言，力图打破童年时期所接受的古老神话，而聂鲁达的诗歌则是大自然力量的直接表现：“那里的大自然使我如醉如痴，十来岁时，我已经是个诗人了。我不写诗，但是小鸟、甲虫和石鸡卵吸引着我。”^①

聂鲁达在16岁时来到圣地亚哥。在寄宿公寓和咖啡馆里度过的孤苦岁月给他的心灵留下了创伤，这也许是他成为诗人的另一个原因吧。

聂鲁达的第一部诗集《晚霞》作于1920至1923年，这是模仿性的作品。但是在《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那种在大城市中的孤独感已经减轻了许多。这部诗集是他两次爱情的结晶：既抒发了对那位特木科姑娘（马丽索尔）的眷恋，也表现了对那位圣地亚哥姑娘（马丽松布拉）的倾慕。这部诗集是少男少女纯真的恋歌，它活跃在过去与现在、黑暗与光明、失去与占有之间。

爱情和大自然是聂鲁达早期创作的源泉，正如他在《诗和人民》^②的讲演中

^① 转引自金·弗朗科的《西班牙美洲文学史》第300页。

^② 这是1957年8月15日聂鲁达访华时，在北京举行的一个欢迎会上的演讲，这个题目是《诗刊》编者加的。

所说的：

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诗。如果一个诗人，他不写男女之间的恋爱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世间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如果一个诗人，他不描写祖国的大地、天空和海洋的话，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诗人应该向别人显示出事物和人们的本质、天性。

毫无疑问，爱情和大自然贯穿着《晚霞》、《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的两个主题。这两部诗集都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如果说巴列霍的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找不到知音的话，《二十首情诗》则很快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些作品自然流畅、韵律精巧、节奏鲜明、风格喜人，将朴实无华的方言与精雕细刻的形象融为一体，尤其受到青年读者的喜爱。许多青年诗人以他为榜样，遗憾的是“画虎类犬”者居多。

1925年他发表了《伟人的尝试》。这部诗集显然受了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虽然不失《二十首情诗》的风韵，但试验的色彩更浓，结构也欠严密。

1933年发表的《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是他在缅甸、锡兰、印尼任外交官期间写成的。对聂鲁达来说，无论从人生道路还是从创作风格上看，这都是一个观察和思考、探索与寻求的时期。由于经济拮据，聂鲁达于1926年辍学。鉴于拉美国家有任命诗人和作家为外交官的传统，他便去外交部谋职。作为一个既无社会背景又无实践经验的初出茅庐的年轻诗人，当然不可能去什么富贵繁华之地，他被派到仰光做领事，以后又去了科伦坡、雅加达、新加坡。上任途中，他顺访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里斯本、马德里、巴黎、马赛，后来又访问了印度、中国等一些亚洲国家。当时他的薪水微薄，看到的是剥削与贫困，接触的是殖民政府的官僚和商贾，这是聂鲁达一生中最苦闷的时期：“东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我在这时期所写的诗，只能反映一个被移植到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的外来人的寂寞。”“孤独培养不出写作的意愿，它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嚎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而在西方，这正是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拉美的极端主义和创造主义令人眼花缭乱的时期，诗人虽然也接受了它们的某些影响，但却难解困惑；在东方，则是神奇与腐朽同在，智慧和愚昧并存，诗人虽然也不乏友谊和情恋，但却充满孤独。《大地上的居所》一、二卷中的许多诗作缺乏逻辑，句式混乱、意象别致、类比新奇的原因概

出于此。

《大地上的居所》第二卷(1931—1935)的基调仍是比较灰暗的,但作品的色彩已较前鲜明。他是1935年2月3日到马德里任领事的。他很快就结识了加西亚·洛尔卡等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创办了《绿马诗刊》,主张诗歌“要有生活气息”,“要横扫纯粹诗歌贫乏的抽象”。

西班牙内战的爆发(1936年6月)打破了诗人平静的生活,也彻底改变了他的诗风。聂鲁达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

第一批子弹射穿了西班牙的六弦琴,当喷出来的不是音乐而是鲜血时,我的诗歌便像幽灵一般在人类受苦受难的街心停住,并开始沿着一股根与血的激流升腾。从那时起,我的道路与大众的道路汇合了。我顿时感到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到了人民的北方,我愿自己卑微的诗歌化作剑和手帕,为人民揩干净沉重苦难的汗水,向他们提供一件争取面包的武器。^①

这时期创作的《西班牙在我心中》以充满生命力的全新面貌出现。诗句朴实无华,充分表现了诗人爱憎分明的激情。1939年他在自己的诗作《愤怒与痛苦》的前面写道:

这首诗是1934年写的,从那时起又发生了多少事情啊!这首诗是在西班牙写的,如今那里已是一片废墟。唉!要是用一点诗和爱就能使世上的愤怒平息,该多好啊,然而这却只有靠斗争和决心才能办到。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落在这些诗句上的血滴将永远留在上面,像爱情一样不可磨灭。

《西班牙在我心中》是由23首短诗组成的。根据英国历史学者汤马斯在《西班牙内战史料》中的记载,《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的写作时间当在1936年11月8日,即第十一团的三个营抵达马德里的日子。当时马德里已进入巷战,两天之后,该团有三分之一阵亡。《赫拉玛之役》写的是1937年春天的一场历时二十余天的著名战役。佛朗哥军队于2月6日突袭哈拉马河谷,旨在截断马德里与巴伦

^① 引自《巴勃罗·聂鲁达:其人、其诗》,见《聂鲁达诗选》(陈实译)。

西亚之间的公路。共和国军守卫在哈拉马河东岸，火线长达 16 公里，国际纵队的四个团协助他们。在整个战役中，共和国军队死伤过万，在志愿军中，以第十五团的“英国营”和美国“林肯营”损失最重，阵亡者在半数以上。志愿军中有不少诗人，有些壮烈牺牲，有些幸存生还，他们有关西班牙内战的作品，后来编成集子出版，聂鲁达的《西班牙在我心中》就是其中的杰作。它热情讴歌了国际纵队战士舍生取义的高贵品格：

弟兄们，从现在起
让男女老幼，尽人皆知
你们庄严的历史、你们的纯真、你们的坚毅，
下至硫磺气体腐蚀的矿井，
上至奴隶非人的阶梯，
让它传到所有绝望人们的心底。

诗人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他不再感到孤独和失望了。随着思想感情的变化，聂鲁达的视野更开阔了。他开始把自己的目光转向外部世界，开始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从 1940 年底到 1943 年，在担任智利驻墨西哥总领事期间，他陆续写出了《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献给玻利瓦尔的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歌颂红军到达普鲁士门口》等诗篇。这些作品连同《西班牙在我心中》、《集合在新的旗帜下》、《愤怒与痛苦》等都收在诗集《大地上的居所（三）》（1935—1945）里。

魏地拉的叛变，反动政府的通缉，对聂鲁达来说，是坏事又是好事。依靠人民群众的保护，虽然他终日东躲西藏，经常搬家，但却在这一年零两个月的动荡不安的生活中，最终完成了他一生最辉煌的著作《漫歌》。

这是一部庞大的诗集。诗人在这部作品中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全部经验和全部理想。这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顶峰，显示了他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卓越的才能。其规模、气势和深度，在拉丁美洲乃至世界诗坛上都是罕见的。

《漫歌》是聂鲁达的代表作，是他创作生涯的里程碑，是他献给整个拉丁美洲、当然首先是献给智利的史诗。在这部宏伟的诗集中，这位代表着大自然的聲音、来自智利南方林区的青年，在经受了城市生活的磨炼和政治斗争的洗礼之后，

现在成了人类的代言人。

《漫歌》分为15章，共有248篇诗作。从美洲对人的召唤——第一章《大地上的灯》象征着人的潜意识——一直写到作者作为战士和诗人的责任，即最后一章《我自己》。其中包括对“征服者”的描述，对“解放者”的颂扬，对压迫者、剥削者、掠夺者、独裁者的谴责，对鞋匠、水手、渔夫、矿工、农民和民间诗人等穷苦大众的赞美以及诗人的生平、愿望和理想。尤其是第二章《玛丘碧丘之巅》和第九章《让那劈木做栅栏的醒来》更是脍炙人口的长篇佳作，是全书的精华部分。

“玛丘碧丘”在印第安土语中是“古老”的“金字塔形山丘”的意思。在这首近500行的诗中，作者不仅回顾了历史的足迹，讴歌了美洲的风光，赞美了人民的品德，同时也表现了他本人从一个空虚的个人主义者发展成为被压迫人民的代言人的过程。全诗分为12节，描写坠入深渊的“我”又登上了玛丘碧丘之巅。这是一次“寻根”的旅行，表明了诗人对这座古城的无名建筑者们的崇敬之情。

于是我沿着大地的阶梯登攀，

从茫茫林海蛮荒的荆棘中间，

来到你——玛丘碧丘面前。

《漫歌》的第九章《让那劈木做栅栏的醒来》也是一首内容广泛、感情真挚、气势磅礴的长诗。诗中写道：

我只不过是一个诗人——我爱你们大家，

在我所爱的世界上漫游；

在我的祖国，他们逮捕矿工，

军人发命令给法官。

但是我爱我小小的寒冷的国家，

即使是它的一枝树根。

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

我也要死在那儿，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

我也要生在那儿……^①

《漫歌》所展示的历史画卷是绚丽多姿、雄浑悲壮的。在《漫歌》中，诗人继承并发扬了安德雷斯·贝略、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的诗歌传统，同时又没有摒弃自己作为先锋派诗人的艺术风格。在这部诗集中，宏观和微观世界都遵循着同一个进化和发展规律：暴政和阶级压迫毁灭了人和大地、阻碍着真正的繁荣。在谈到《玛丘碧丘之巅》一诗的创作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秘鲁停下来并登上了玛丘碧丘遗址。因为当时没有公路，我们是骑马上去的。我从高处看到石砌的古老建筑嵌在青翠的安第斯山高耸的群峰之间。激流从风雨侵蚀了千百年的城堡奔腾而下。维尔卡玛约河上的白色云雾袅袅升起。站在那岩石的脐心，我觉得自己何等的渺小，那是一个傲然耸立、荒无人烟的脐心，我不知为什么感到自己属于它。我觉得在某个遥远的时刻，我的手似乎曾在这里掘过沟壑，磨过岩石。我觉得自己属于智利，属于秘鲁，属于美洲。在这崎岖的高地，在这辉煌的、分散的废墟，我找到了继续创作诗歌的信念。《玛丘碧丘之巅》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在《漫歌》中，这首史诗中的史诗是最引人瞩目的一章。这是一首抒情的政治诗，将聂鲁达诗歌的两种倾向、两种风格融为一炉。这既不同于《西班牙在我心中》的明朗，也不同于《大地上的居所》的晦涩。它的结构严谨，文字凝练，意境清新，视野开阔。这是对泥土与岩石的赞歌。这是对自然与人生的思考。这是一次寻根の旅。诗人对于现代人单纯追求物质文明的悲悯，对于轰轰烈烈的战斗和牺牲的向往，都通过丰富的想像和隐喻表露出来。这不是梦，不是呓语，也不是单纯的怀古诗。它的确不易读；但也的确具有鲜明的主题。读者只要把想像的触须伸长些就不难捕捉诗人发出的扑朔迷离的信号。

与聂鲁达的其他作品相比，“纪实性”和“散文化”是《漫歌》的突出特点。诚然，并非《漫歌》中每首诗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比如有些斥责独裁者的诗篇就因过于简单和直白而缺乏艺术的美感。对《漫歌》这样一部“通史”性的巨著，读者不可能要求它尽善尽美，更何况读者的审美情趣和欣赏角度又千差万别呢。“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实作者对此早有预见，他说：

① 节选自蔡其矫所译《让那劈木做栅栏的醒来》。

我并非为自己的作品辩护。一本像《漫歌》这样的巨著，总会是有人喜欢这一部分，有人喜欢那一部分。许多人一点也不喜欢。当它成为一幅广阔的风景画卷时，我的宏愿是获得了成功的。

在《漫歌》之后，聂鲁达写了另一部著名的诗集《葡萄和风》，这是他在访问欧洲、苏联和中国以后创作的，是他参加一系列保卫世界和平的政治活动的记述。然而高涨的政治热情和频繁的社会活动并没有影响他在那不勒斯匿名发表一系列爱情诗。《船长的诗》（1952）即是这样的作品，它是献给玛蒂尔德的，是“自然之爱的结晶”。她后来成了诗人的第三任妻子。十年后，诗人才公开承认这些诗是自己的作品。

在这个时期，除了政治诗和爱情诗外，他还创作了一种更富于哲理性的诗歌。这就是《元素的颂歌》、《元素的新颂歌》和《颂歌第三集》。这些作品歌颂了普通的劳动者和平凡的事物。聂鲁达在创作这些颂歌的时候，似乎在尝试用新的眼光，从新的角度去观察日常生活中的人和物，探索其中蕴藏的美与善的因素。这些颂歌与《西班牙在我心中》那种一气呵成的节奏迥然不同，它的语言简洁、活泼，节奏缓慢，一步一顿，一句诗分成几行，每行只有两三个甚至一个字：

在高耸、
陡峭的山脉，
凿石，
钉木板，
缝衣，
砍柴，
捣碎土块……

这些诗歌的朴实、欢乐与《大地上的居所》的朦胧、生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58年，《狂歌集》出版，诗人的想像力得到更加自由的发挥。《关于美人鱼和酒鬼的寓言》是其中最好的诗。美人鱼超出了自己的自然本性，因而成了不理解她的人们仇恨和蔑视的对象。在奇特的比喻中，美人鱼不愿忍受酒吧间里的污辱，选择了纯洁和死亡，从而可以看出诗人对自己身世的隐喻和对洁身自好的追求。

在《狂歌集》之后，聂鲁达倾向于重复前期作品的模式，对平凡事物、大海和爱情的歌颂是他作品中的三个焦点。《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智利的石头》是其中轮廓比较鲜明的作品。

60年代以后，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诗人陷入了迷惘和彷徨的心境，作品的内容比较复杂，格调比较消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信心：

你只要上街，
便会看见我带着提琴，
随时准备歌唱，
随时准备献身。

聂鲁达的作品，所以能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他写人民的题材是分不开的。尤其在进入成熟期之后，他所描写的都是时代的重大题材，如西班牙内战，智利人民的斗争，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拉丁美洲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等等。在将政治转化为诗歌的过程中，他注意保持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注意将现实主义的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比亚当还赤裸裸地去投入生活，但是我的诗却要穿戴整齐，这种创作态度是一点也不能打折扣的……”

至于聂鲁达的艺术风格，很难将它划入某一个流派。如果一定要说它属于什么“主义”，只能说它属于“聂鲁达主义”，因为他的艺术风格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相互融合的产物。

在拉美和世界诗坛，长期以来，聂鲁达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比如，他与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就有过激烈的争论。除了对艺术的见解不同之外，他们的分歧主要还在于对诗歌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追求。有的要超越现实，有的要贴近现实，有的着眼于人类的自然属性，有的着眼于人类的阶级属性。聂鲁达显然属于后者。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诗人所进行的是认真的辩论，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更可贵的是他们都尊重对方，并承认对方的成就，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争论了三十多年之后，又重归于好。他们对于诺贝尔文学奖都是当之无愧的。

为了纪念聂鲁达诞生 100 周年，我和我的学生滕威编过一本《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书出版后，林贤治先生打来电话，约我们为花城出版社再编一本关于聂鲁达的书，收入文学大师纪念文库。书的编法与《肖像》不同：五分之三是诗作，五分之一是诗人自己的回忆，五分之一是别人的评论。总之，尽量全面、客观地将这位伟大的智利诗人介绍给我国读者。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在选作品的时候，我们选用了聂鲁达不同时期、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作品，而且是不同的译者翻译的，以求尽可能客观地体现诗人的全貌与特征。在选评论的时候，我们刻意选取了一些和聂鲁达政治观点、诗歌主张不尽相同的诗人对他的分析与评论，尽量避免空洞的溢美之词。如西班牙著名诗人路易斯·罗萨雷斯（Luis Rosales，1910—1992）为 1974 年诺格尔版《聂鲁达选集》写的序言就是这样的文章。罗萨雷斯属 1936 年一代，自 1962 年起任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1982 年获得了塞万提斯文学奖。他生前是聂鲁达的好友，但在政治、思想上与他又截然不同。他的家庭有长枪党的背景。当年加西亚·洛尔卡就是隐藏在他家的，但由于宪警与长枪党的矛盾，格拉纳达的天才诗人最终未能逃脱厄运。应当说，他对聂鲁达的评价是中肯的，是有参考价值的。当然，究竟对聂鲁达该如何评价，向来是见仁见智、并非众口一词的。在这方面，我们更相信广大的读者，他们会做出正确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

今天，在书稿即将付印的时候，我要衷心感谢林贤治先生和花城出版社，没有他们的精心策划，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同样要感谢陈实、林之木、林光、申宝楼、朱景冬等先生，本书采用了他们的部分译文；还要感谢我的学生滕威和卜珊，后者为本书翻译了《船长的诗》中的作品，前者为本书做了大量的编译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她辛勤而又有效的工作，本书的出版也是不可能的。此外，徐德林、李阳、刘岩、刘佳、经纬、周娇贵等几位研究生亦参与了本书部分资料的翻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至于本书的不足之处，肯定在所难免，这应由我一人负责，恳请读者和同行不吝赐教。

赵振江

2007 年 10 月 25 日 于蓝旗营

目 录



高山的意志，大海的情怀

——聂鲁达的生平与创作	001
-------------------	-----

诗 歌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 年)	003
第七首	003
第十四首	004
第十八首	005
《大地上的居所》(1925—1947 年)	007
诗的艺术	007
孤独的骑士	008
惟有死亡	010
船歌	012
献给费德里柯·加西亚·洛尔加的颂歌	014
忘不了(奏鸣曲)	019
赫拉玛之役	020
《漫歌》(1950 年)	023
大地上的灯	023
爱的亚美利加(1400)	023
兽类	025
河流赶到	026